

# 他深情地目送我走进电梯

## ——忆法国史学大师勒高夫先生

■许明龙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链接

2014年4月1日,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巴黎去世,享年90岁。1924年1月1日,勒高夫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土伦;年轻时曾赴荷兰、捷克、英国、意大利等国游历或求学,亲眼见证了“布拉格之春”,对他的人生观产生重要影响。1957年出版《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一举成名。该书探究了中世纪大学和古代以来欧洲第一批靠思想和教书活动维持生存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产生的情况。这部作品使他得到了年鉴学派的关注。

1959年,勒高夫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助教并进入《年鉴》杂志工作。随后从1962年起在巴黎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任职。第六部是年鉴学派的大本营,后来改组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1969年起,勒高夫接替布罗代尔之手,与勒·胡瓦拉杜里和马克·费罗一起担任《年鉴》主编,主要从事心态史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1972年,他继吕西安·费弗尔和费尔南·布罗代尔之后,就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至1977年。

勒高夫秉承年鉴学派注重结合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研究风格,长于12到13世纪的中世纪文化史,认为中世纪是个迥异于古典与现代的特殊文明。从他的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勒高夫的史学研究大都注重时段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着力描写人的日常生活;此外,他并不局限于某种狭窄的领域,力图打通各个学科领域的局限性,做到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研究。

勒高夫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著作,对法国当代史学有着显著的影响,主要作品有:《中世纪的商人与银行家》(1955)、《中世纪的知识分子》(1956)、《中世纪的西方文明》(1964)、《为另一种中世纪史而奋斗》(1977)、《炼狱观念的诞生》(1981)、《基督教的鼎盛》(1982)、《交易所与生活》(1986)。他还参与主编《研究历史》(1974)和《新史学》(1978)两本著作。

勒高夫的历史著作在中国出版有近10种,如《圣路易》(商务)、《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中世纪文明》(上海人民)、《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上海人民)、《历史与记忆》(人民大学)等。据商务印书馆编辑张艳丽介绍,目前商务还有两本勒高夫的作品《炼狱的诞生》和《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准备出版,其中后者即将推出。

勒高夫绝不是固守故纸堆的历史学者,他懂得历史与现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坚持通过媒体普及历史文化。他生前每周都会在公共电台“法国文化”主持一档历史节目。1986年,根据意大利小说家埃科《玫瑰的名字》改编的同名电影开拍,勒高夫以中世纪史权威的身份担任电影历史顾问。

为纪念这位史学家,本报特约请法国史专家、《圣路易》一书译者许明龙先生撰写文章。



吴奔星先生1980年代讲课风采

# 追思实践型教育家吴奔星先生

■李继凯

甲午春节期间,我曾在微信中转发朋友发来的一首诗《别》的音频,这是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丫、刘芳菲朗诵的,听来感人肺腑。微友们纷纷点赞或评论,甚至还说出了名师必出高徒这样的赞语。由此我也再次想起了大学本科求学的情形,尤其是这首诗的作者吴奔星先生为我们上课时的情形。那是1978年初,我国刚刚恢复高考不久,我作为首批通过考试进入高校(徐州师范学院,现更名为江苏师范大学)的“77级”学生,对知识的渴求无疑是很强烈的。而那时的教师也格外抖擞精神,从事教学特别认真。吴老师那时是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唯一的资深教授,因年事已高,讲课并不多,但每一次讲课都会给听者带来深切的感动和丰富的启示。他声音洪亮,情理交融,幽默生动,尽管带有湖南口音,却能字字听得明白。我当时最喜欢听吴老师上课,他高声朗诵,我也会情不自禁地轻声跟进;他那丰富的表情和挥动的手势,也仿佛具有某种魔力,强化着他的表达效果。

在我看来,吴先生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确实达到了很高水平,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与学生互动中的言传身教都是如此,从主导方面看,堪称是一位成功的“实践型教育家”。事实上,他很早就高度关注教育问题,19岁就撰写了《今后中国教育之趋向》发表于湖南私立修业农业学校主办之《修农》第1期;次年,又撰写了《由中国教育现状谈到农业教育之重要》发表于《修农》第2期。后来,除了抗战期间就在浦江清、朱自清等主办的《国文月刊》发表了《中学国文教学的“分工合作制”》、《中学国文教学法的出路》等多篇当时就有影响、至今还被论者提及的语文教学论文外,他也有关于课程教学方面的教育学专著《语文教学新论》,堪称是我国从事语文学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198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其实,这也是一本教材型著作,对青年学生尤其具有参考价值,迄今也常被本专业研究生视为重要的参考书。《专业论文》,吴先生一生从事的并非“专业诗人或作家”,而主要是教师。正是为了教书育人而著书立说,为了给青年学子提供精神食粮,促使吴先生撰写或编著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有《语文教学新论》、《阅读与写作的基本问题》、《文学作品研究》、《鲁迅旧诗新探》、《文学风格流派论》、《中国现代诗人论》、《诗美鉴赏学》、《虚实美学新探》等专著,也有诗话、诗选及辞典等方面的著作。事实上,这些著作都在教学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全国乃至更大范围传播了现代“新国学”意义上的学术文化,哺育了无数的青年学子。

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政治动乱,建国后的教育事业出现了种种无序状况,高等教育发展尤其缓慢,甚至出现了严重倒退。吴奔星先生也深受其害,直至晚年才有了指导研究生的机会。他也特别看重这个工作,对研究生采取了因人施教的个性化培养方式,强调要快乐读书,趣味研究,不仅体现了“前卫”性的教育观念,而且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仅仅招收过两届研究生,共五名硕士生。他们是:徐瑞岳、孙晨、宋建华、李程骅、张鹰。这五位被人称之为“吴门弟子”的学生,个个身手了得,皆得吴先生真传,皆为学人中的佼佼者,迄今都已经在学术研究与实际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吴门弟子”都深受吴先生的影响,薪火相传,将学术文化血脉延续了下来。恰如其高足宋剑华

所言:“我得益于先生,而我的学生又得益于我,‘吴门学派’因此而得以一脉相传,这是为师者最大的心愿,现在应该说已经成为了现实。因为我们始终都是先生的学生……”,也如其年龄最小的研究生李程骅所说的那样:“名家教诲浸润身”,“来世仍祈入吴门”。

其实,祈望进到吴门里面请教学业问题且实际已经进入过的学子很多,并不限于五位研究生。吴先生一生辗转多地从事教育工作,仅在徐州一地就有20余年。在吴心海先生编辑的《别——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一书中,吴老师更多的本科学生也深情回忆起往日领受的教益。如他的学生邓星雨也是77级学生的授课老师(那时是教研室几位老师轮番授课,分工明确,各自都多讲自己最熟悉、最有研究的内容)之一,我从邓老师的授课就能感受到那和吴先生一样的激情。邓老师高度认同吴先生“诗学是情学”等学术观点,在学科研究领域也一直追随吴先生,甚至对吴先生旧体诗也喜爱有加。他认为吴先生超迈人生坎坷的通达、豁达体现了大师的风范。而吴先生的“华盖罩头人易老,斜阳劝我笑呵呵”等诗句,和其名诗《别》一样“必为传世绝唱”。像邓老师这样的本科生,吴先生究竟教过多少人已经无法统计。由此吴先生自然是能够享有“桃李满天下”的美誉的。而在这样“群众化”的群生之中,辗转走向西部的我就是其中普通的一个。

除了听过吴先生讲课,我还幸运地受过吴先生耳提面命的教导。那是因为要做毕业论文了,我的指导教师便是吴先生。吴先生要求确实很严格。第一次谈话就要求我确实论文提纲和相关笔记及资料卡片。待准备一段时间后,便让班干部通知我到他家中细谈相关问题,我首先按要求递交了提纲及相关笔记等,他翻阅后便仔细指点如何调整选题,如何使用材料,如何用精炼的语言阐述问题,并规定了论文初稿提交的时间。关于这样幸运地被“面授机宜”的经历,我曾在《民族魂与中国人》一书的后记里写道:“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交的毕业论文便是谈鲁迅《野草》的。记得当年吴奔星先生在我的论文初稿上,打了一些‘耳朵’(?)。他诙谐地嘱我将‘耳朵’的地方再好好思考一番,修改一下。他那微眯着笑、和善可亲的眼神,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我还在《文艺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这段经历。但我的简单回忆中都忽略了我当时的紧张和焦虑。本来搞鲁迅研究在当时就具有挑战意味,何况这是最难啃的《野草》!我隐隐感到了吴先生的担忧,更感受到他的鼓励和督促。我的毕业论文最终定名为《试论鲁迅〈野草〉国民性思想》和“化丑为美”的艺术特色”,字数也在万字左右,不仅赖此拿到了学士学位,也为后来走上学术道路埋下了伏笔。当我毕业后仍然带着这篇再度加工的论文参加了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的学术会议时,吴先生已经回到了南京师范大学,且被选为学会的副会长。那次会议是在南师图书馆召开的,会议室的红地毯和严肃活泼的学术氛围感染了我,吴先生等老一代学者的讲话启发了我,让我更加坚定了从事学术追求的决心。接下来,当这次学术会议论文集寄到我手中的时候,我已经到了古都西安开始攻读现代文学专业、鲁迅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了。

吴先生的言传身教对我的教学、科研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实践型教育家。我也相信,如果能够认真发掘、整理相关文献,包括他对学科专业的建设及其贡献等资料,参照相关教育研究的规范,定然可以写出更为坚实的相关论文,或者编出更能体现其教育实践及思想的论著。

1999年1月29日,在法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新年招待会上,文化专员戴鹤白先生把著名法国历史学家勒高夫的新作《圣路易》交到我手上,让我译成中文,由此开始了我与勒高夫先生的交往。

《圣路易》1996年在法国出版,受到学界高度评价,被众口一词地称作勒高夫先生的又一佳作。法国史学界的一大幸事。法国驻华使馆希望及早把此书介绍给中国读者,于是通过商务印书馆找到了我。虽然我忝列法国史研究者,在大学里学过法文,事先戴鹤白先生也在电话中与我商量过翻译此书的可能性,然而,当我手捧着这样一部一千多页的名家名作,想到这项任务的分量和困难时,除了诚惶诚恐,更多的是忐忑不安,只怕糟蹋了作者,对不起读者。

从这一天到2001年3月28日交出译文初稿,历时两年有余,其间我受到作者勒高夫的种种帮助,至今难以忘怀。可以说,没有他的点拨和帮助,我可能没有勇气和勇气完成这项对我来说十分艰巨的任务。

翻译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难点,我尽力从辞典和书籍中查找答案,也不忘求助高人。然而,一则限于我可怜的欧洲中世纪历史知识,一则由于相关的工具书和参考书不易找到,因而有不少难点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境。无奈之下,我贸然致函勒高夫先生,请问他是否可以为我答疑。先生立即回函,对我的困境表示充分理解,安慰我不必过于自责,因为欧洲中世纪离中国人实在太远,读不懂或译不出某些语句或段落,一点也不奇怪。他表示,为我解困责无旁贷,让我把问题汇总后寄给他,他尽快给予回答。我先后寄了两次问题,合计数十个。勒高夫先生的倾心相助竟然成了我得寸进尺的理由,我把出现在书中的一些拉丁文书名和引语,也“打包”请他提供法文译文。过了不久他就按我的要求寄来了相关的法文。现在想起此事,深深责怪自己的唐突和无礼,因为在北京并非找不到既懂拉丁文又帮得起的学者,何必舍近求远,给勒高夫先生添乱呢。

然而,并非所有问题都可以在通信中解决,尤其是对于作者本意的理解。于是,2000年9月我去了巴黎,当面向勒高夫先生请教此行首要任务。9月28日,我如约到勒高夫先生的寓所拜见神交已久的老师。先生的热情出乎意料,详尽地一一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说实话,开始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有些问题可能在他看来太“小儿科”了,丢我的脸事小,浪费他的时间事大。我无从知道他作何感想,但从他的言辞和表情,我没有发现他有一丝一毫的不耐烦。

我们谈得较多的是“圣路易存在过吗?”这个问题。先生说,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乍一听确实有点怪,既然整本书写的都是圣路易和与他有关的人和事,历史上当然确有圣路易其人,怎么又问他是否存在过呢?其实,这个问题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与圣路易相关的史料是否反映了他的真实面貌?据他观察,很多史料并非圣路易在实际生活中的真实写照,而是按照人们心目中一个国王和圣徒的标准和模式来刻划的。就此而言,圣路易与其他国王和圣徒大同小异,既无个性,也无特色。难道可以把这样一个圣路易视为曾经存在过的真实的圣路易吗?其二,圣路易是国王和圣徒,但同时也是一个与凡夫俗子一样的普通人,是一个儿子,是一个丈夫和父亲,他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他甚至在教会中的禁令和肉欲之间痛苦地挣扎。如果舍弃这些看似与政治和宗教无关的细节,那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圣路易就很难说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真实的圣路易。

接着,先生问起我在翻译中遇到的困难,他说,他虽然不懂汉语,但想象得到,从法文译成中文的难度,绝非从法文译成任何一种欧洲语言所能比拟。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对他的说法表示认同,只是笼统地说,确实遇到一些

困难,尤其是涉及欧洲封建制度和基督教的一些专门术语。说到这里,我问了他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明末清初以来,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在教会人士和信徒中通行着一些有关教仪的词汇和术语,例如,他们把“忏悔”称作“告解”、“办神工”。如果按照信徒的语汇翻译,一般读者可能感到生僻;如果不按照信徒的语汇翻译,信徒和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定会觉得译者“外行”。当我就这个问题请教先生时,他毫不犹豫地,宁可被少数人指责“外行”也不能为广大读者。我接着说,排印中的瑕疵有时也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先生表示很吃惊,立即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圣路易》原书,让我一一指出。这实在是将我一军,我随便这么一说,哪里想到他会如此认真,若是举不出实例来,我岂不是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说吗?幸好,我还记得一个费了我许多时间才弄明白的错字:fieldword,这是书中提及的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一部著作中的一个词,我查找了包括韦伯斯特大词典在内的许多英文辞典,最终才确信fieldword是field-work之误。我翻到这个词所在页,指给先生看,他“啊,啊!”了几声,似乎有些意外,也有些许遗憾,大概也相信了我所说不假。

其实,我这次前去拜见勒高夫先生,还有一个不敢贸然表达的愿望:请他为《圣路易》中文版作序。谈话进行到这里,我觉得提出这个请求的时机已经成熟。先生一点也没有推辞,似乎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他说,他的著作能够与中国读者见面,令他十分高兴,他对中国虽然谈不上非常了解,但他对这个伟大的国家始终抱有巨大兴趣和高度关注。迟至从18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和文明一直是许多欧洲人关注的对象,中国在世界历史和文明中拥有崇高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他虽然不甚了解中国的历史人物传记,但他知道,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绘声绘色的人物传记。《圣路易》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物传记,但希望中国读者能从中了解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诠释历史人物的理念和手法。接着,先生不耻下问地让我说说,在序言中应该写些什么。我强调了中国的所谓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巨大差异,希望他能就此给中国读者一些启蒙性的指点,这样或许有助于中国读者读懂《圣路易》。

2000年末,勒高夫先生动了一次大手术。翌年开春,他不顾木后体衰,写就中文版序寄发给我,令原以为这篇序言肯定泡汤的我既意外,更感动。

2001年6月19日,我再度到寓所拜见勒高夫先生。与上次会见略有不同的是,当年3月,我已向

出版社交出《圣路易》译稿,所以,这次不像上次那样有许多问题要当面向他请教。如果说上次会见主要是为了当面请教,这次则可视为礼节性拜访。除了寒暄,谈话更多涉及《圣路易》在各地的反响。先生告诉我,从1966年出版到此时的2001年,据他所知,不到五年时间,以各种语言翻译出版的《圣路易》已经将近20种,尽管我知道这部杰作在各国广受认可和赞誉,但不曾想到其译本竟然如此之多。看我惊讶的神色,先生不顾行动不便,颤巍巍地起身到书房取来了几种译本,可惜我现在记不清楚当时究竟看到了几种。印象最深的一部波兰文译本。或许我有些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下意识觉得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使用波兰语,波兰人何必花费巨大精力和财力,把这种“小众读物”译为本国文字。当然,面对这个译本,我不得不佩服于波兰人对学术的重视,由此也可想见勒高夫先生的大作在波兰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先生由此说到中文版,他说,这许多各种语言的版本中若无中文版,岂非憾事。于是他问我中文版何时问世,我回答说,已经进入编辑流程,年底之前肯定能与读者见面。他叮嘱我一定要寄样书给他,还要及时将学界和读者的反映和评论告诉他,说他特别重视中国人的看法。我一一应允,表示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

先生健康不佳,我不宜骚扰他太久。告别的时刻到了,我祝他健康,请他多多保重,表示有机会再度访问法国,一定忘不了前来看他请安。他费力地站起来要送我,我知道,法国人通常并无送的习惯,何况他术后尚未完全复元,行动相当不便,于是伸出双手轻轻按着他的双肩,请他坐下。可是,他坚持要送我到寓所门口,拦也拦不住,我只好同勒高夫夫人一起扶着走到门口。先生的住宅在公寓楼的尽头,户门开向走廊。我请他转身回房,他却非要站在门口看我离去。他身子侧向右侧,右手举到肩膀的高度,扶着门框,深情地看着一步步离去的我,我回头向他挥手示意,请他赶紧回屋,他以微笑作答,身子却依然斜靠在门框上。见此情景,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免得他站立过久,可是,充其量十几二十米的走廊此时却显得长而又长。终于走到电梯门前,我侧身最后望了一眼,他依然保持那个姿势,目送我走进电梯。

十余年过去了,勒高夫先生手扶门框的景象依然那么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令我永生难忘。如今他到另一个世界了,我依中国人的习惯,衷心祝他一路走好!